

权力转移、体系演化 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

漆海霞 孙兆瑞

内容提要：权力转移会伴随大规模战争吗？如果回顾中国古代经验，春秋时期霸权国的更替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从体系演化和规范变迁的角度加以解释，并提出以下假设——权力转移过程中是否爆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受到崛起国与霸权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国崛起方式究竟是采用尊周模式还是强权模式的影响。春秋初期霸权国选择尊周，但是周天子接受霸权国的地位会导致自身合法性被削弱，进而导致规范退化，使之后的崛起国更倾向于争强模式，结果便是大国战争增多。文章构建了两个三方演化博弈——周天子、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三方互动，以及周天子、霸权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间的互动，博弈均衡解印证了上述假设。此外，文章还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的争霸路径进行了案例比较，从而有力解释了为何春秋早期争霸战争较少而春秋晚期战争增多的现象。

关键词：权力转移 春秋争霸 演化 尊王攘夷

作者简介：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孙兆瑞，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一、导 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强大，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日益明显。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到特朗普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中的

^{*} 本文的思路得益于与时殷弘老师、周方银老师、杨原老师和宋伟老师就春秋体系的探讨，也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 当代亚太

竞争性日益凸显。在美国一系列举措背后，蕴含着其根深蒂固的“中国威胁论”^①等现实主义思想。

如果我们先入为主，以西方近几百年的历史为依据，特别是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依据，可能难以脱离遏制理论的窠臼。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西欧长期分裂，而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状态；西欧各国长期奉行均势策略，而中国曾在东亚构建朝贡体系。^②因此，我们可以转而关注中国古代经验，从中汲取营养，以便发现权力转移过程中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春秋霸主国间的权力转移现象值得关注。我们可以发现，在春秋早期，从齐国到晋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齐、晋之间直接的争霸战争，但是在晋国、秦国和楚国的霸权更迭中，则相互间战争频仍。为何同样是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却时而发生战争，时而和平过渡？与之相关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何中国先秦体系会从春秋争霸转向战国兼并？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对权力转移、体系规范等加以探究，进而从演化博弈的角度进行解释。

二、文献回顾

（一）权力转移、制衡与崛起战争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大国特别是霸主国和崛起国实力接近时，大战爆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163-177;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55;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2014, pp. 52-91; Ronan Tse-min Fu, David James Gill, Eric Hundman,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Looking for Asia’s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2015, pp. 181-204; Avery Goldstein,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49-89.

^② 漆海霞、曾绍毓、李翌：《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明朝朝贡秩序稳定的原因》，载《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1期，第3~27页。

发的可能性加大。^① 奥根斯基 (A. F. K. Organski) 等学者指出, 新兴的崛起国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利益分配安排, 从而选择挑战现状。而霸主国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利益和国际领导地位拱手相让, 因此, 崛起国的崛起过程容易引发战争。^② 也有学者从追逐地位和等级的角度解释国家间的竞争, 提出由于国际地位是位置性的 (positional),^③ 因此, 要获得国际地位, 就要取得大国集团的认可。当大国集团是封闭的而不开放时, 崛起国难以通过常规方式获得地位认可, 因此容易采取竞争性强的冲突和战争等方式谋求地位。^④

理性战争学派从承诺不可信的角度加以分析。鲍威尔 (Robert Powell) 认为, 权力转移会使国家倾向于违背承诺, 从而引发预防性战争。在权力转移时期, 崛起国预期自身实力增长速度快于霸主国, 倾向于在未来实力足够强大时违背当前的承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霸主国不会轻易允许崛起国正常发展, 可能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⑤ 对于这类预防性战争, 有学者指出, 信息透明可能是解决途径之一, 若各国的军事实力信息是透明的, 预防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反之, 若信息不透明, 则会增加各方关于意图和实力判断的不确定性, 预防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较大。^⑥ 但是, 在权力转移的情况下, 衰落的霸主国并不明确崛起国的偏好, 霸主国除了对崛起国进行预防

①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Woosang Kim, "Power, Alliance, and Major Wars, 1816-1975",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2, 1989, pp. 255-273; Woosang Kim,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 153-172.

②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③ David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 1996, pp. 1-33; David Lake, "Domination, Authority, and the Forms of Chinese Pow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4, 2017, pp. 357-382.

④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

⑤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pp. 169-203.

⑥ 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 Monteiro, "Known Unknowns: Power Shifts, Uncertaint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1, 2014, pp. 1-31.

□ 当代亚太

性战争之外，还有对冲（hedging）这一选择。如果霸主国与崛起国双方的利益高度不相容，衰落的霸主国倾向于对崛起国发起全面的预防性战争；在崛起国与衰落的霸主国之间的利益相容度较高时，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不等价于衰落霸主国付出的成本，衰落的霸主国可能采取对冲战略。利益相容度的核心是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现状的改变程度。^①

上述研究都讨论了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权力转移理论还是理性战争理论，都认为霸主国与崛起国间的战争是一个机械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重复“均势被破坏—战争—恢复均势”的循环。实力变迁是战争的根源，但是，霸主国与崛起国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上述理论都是基于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然而，基于中国的历史，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的争霸并不必然导致战争，有时也会实现和平过渡。因此，本文认为，我们需要跳出霸主国与崛起国这一国家层面的视角，从国际体系角度加以解读。

（二）规范退化、体系演化与战争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体系演化与规范退化均可解释大战的发生。体系演化用生物学的“演化”（evolution）机制来比拟国际体系的变迁逻辑，学者们倾向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加以解释，例如，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解释国际体系变迁时强调社会化进程与国家间竞争的互动。^② 许田波分析了战争与国家改革对中国战国体系终结的影响。^③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国际体系的变迁是从霍布斯文化演变为洛克文化的过程，未来将进一步演变到康德文化。^④ 唐世平从战争与攻防的角度，指出了国际体系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变迁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等各种状态的演化。^⑤

^① Brandon K. Yoder, “Hedging for Better Bets: Power Shifts, Credible Signals, and Preventiv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4, 2019, pp. 923-949.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76-77.

^③ 参见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除了体系的演化之外，近年来，学界集中于讨论国际规范的演化问题。有学者认为，接受不同规范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竞争，导致了国际规范的演化。^① 芬尼莫尔 (Martha Finnemore) 等学者根据对干涉的研究，总结出“规范生命周期论”，认为存在规范兴起、规范扩散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② 麦基翁 (Ryder Mckeown) 认为，芬尼莫尔的“规范生命周期论”是进化的，规范一旦内化就不再改变。然而，现实中也存在规范退化的现象。首先是修正主义者挑战现有规范；其次是修正主义者与规范维护者之间的竞争；第三阶段是规范的退化，此时，规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其影响力降低。^③ 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等分析了国际规范扩散的三条路径——常规说服、外部经济和军事诱惑、强制改变他国内政，并指出，当新的规范有利于霸主国而且其他国家的精英都承认新规范的重要性时，新规范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④ 阎学通教授从领导力角度解读国际规范的演化，他认为，主导国的领导人可以通过“示范—效仿”（即主导国以身作则），“支持—强化”（即主导国对接受规范的国家提供支持），以及“惩罚—维护”（即主导国对不接受规范的国家加以惩罚）这三种路径推进国际规范的演化。^⑤

国际规范的退化可能导致战争的数量和剧烈程度相应上升。但是，体系演化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复杂，难以说清何者为因何者为果。规范的退化与战争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规范会影响大国的选择，大国的选择进一步导致规范的退化。概言之，不论是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还是规范演化理论，我们都可以得到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大概率会发生争霸战的结论。然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我们可以发现，霸权更迭时发生争霸战的概率是不同的，例如，从齐国到晋国的权力转移没有出现齐晋之间直接的争霸战。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机理。

① Ann Florini,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 No. 3, 1996, pp. 367-380.

② 玛莎·芬尼莫尔：《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袁正清、李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s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③ Ryder Mckeown, “Norm Regress: Revisionism and the Slow Death of the Torture N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1, 2009, pp. 5-25.

④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p. 283-315.

⑤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 当代亚太

三、崛起策略、合法性与争霸战争

(一) 崛起模式与争霸战

对于权力转移时期的争霸战争，尽管上述文献中各流派存在分歧与争议，但仍可以发现，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权力转移过程中，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然而，中国古代的经验提供了不同的事实。在春秋时期的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有时没有体现为争霸战的方式，例如，从齐国到晋国的霸权更迭；有时会体现为烈度高且时间持久的战争，例如，晋楚争霸多年，直至弭兵会盟才确立晋楚两霸并立的局面；有时会体现为烈度较低的战争，如秦晋崤之战。可见，对于纷繁复杂的中国古代历史，单一的理论无法解释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更细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尽管齐国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第一任霸主国，但在齐国之前存在郑庄公小霸。郑庄公并没有被公认为霸主，原因在于郑庄公对周天子权威直接挑衅的行为不被当时的各诸侯国所认可，而齐桓公尊周的称霸方式更容易被各国接受。郑庄公对周王室不敬，不论是周郑互质^①还是与周王交战^②，都削弱了周王室的权威，同时也影响了郑庄公在各诸侯国之间的风评。各诸侯国之所以不赞同郑庄公挑衅周天子的举动，原因之一是周天子的合法性有助于维持各诸侯国内政的稳定。例如，卫国的州吁弑杀桓公后自己当了国君，然而国内民心不附，为了稳固统治，就想去朝见周天子以加强合法性。^③ 尽管周王室自周平王东迁后权威下降，但是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依然遵守周礼，以维护国际秩序。诸侯国只有尊奉周天子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其他诸侯国的认可，否则将会受到其他诸侯国的谴责，支付昂贵的声誉成本。然而，郑庄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没有选择通过尊奉周天子来获得合法性，而是试图与当时的周平王平起平坐，这是一种僭越的行为。郑国不尊重周天子，也就无法获得

① 左丘明：《左传·隐公三年》“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② 司马迁：《史记·郑世家》。书中记载：“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③ 左丘明：《左传·隐公三年、四年》。

周天子所给予的合法性，进而也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霸主国不仅仅是实力最强的国家，更是领导地位被各国所接受的领导者。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权力角度判断一国是否成为霸主，还要看霸主国是否具有合法性，亦即其他诸侯国是否接受霸主国的领导。首先，这涉及“名分”的问题，^① 诚所谓名正言顺。周天子和诸侯重视“名分”，通过周礼、血脉和正统性等维系各自统治的合法性，进而维护整个秩序的稳定。其次，从治理的角度看，霸主国要给当时的国际社会（诸侯国）提供安全保障等公共产品。上述手段都有助于大国获得合法性。合法性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注重合法性，则不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为现状挑战国，遭遇大战的概率降低。^② 目前的权力转移研究忽视了规范的作用和合法性的影响。本文将崛起国的争霸策略按照是否尊周区分为尊周和争强两类，尊周模式需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而争强模式则往往需要在争霸战中获胜。由此，本文提出第一条有关合法性与战争的假设。

假设 1：权力转移过程中是否爆发战争，除了受到崛起国与霸主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国崛起方式的影响。如果两国都采用尊周的模式，则战争概率较小；如果两国都采用争强模式，则战争概率较大。

（二）周天子合法性变迁与争霸战

假设 1 认为，尊奉周天子是崛起国的理性选择，然而，为何春秋后期的霸主国对周室的尊奉程度下降？为何从春秋阶段进入战国阶段后，诸侯国不再争霸，转而争强？春秋时期发生过两次大型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从齐国转移到晋国，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第二次是从晋国转移到楚国，两国之间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正面战争。两次权力转移的表现大相径庭，从崛起模式看，齐国、晋国和秦国都采用尊周模式，但是晋国为霸主时期的战争明显较多。为何越到春秋晚期，大国间的战争越频繁？

“礼崩乐坏”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然而，“礼崩乐坏”只是现象，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究。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认为，周天子的合法性下降的原因在于周天子自己的选择，亦即周王将不符合当时规范的分晋三

^① 司马光指出：“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②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a Glob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S1, 2003, pp. 75-95.

□ 当代亚太

家大夫承认为诸侯，破坏了“先王之礼”。^①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春秋时期的中国经历了“规范退化”。在体系演化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选择决定了演化的方向。霸主国不仅是各诸侯国选择的结果，也会进一步影响未来的国际格局和秩序。在传统的礼制体系中，接受国际规范不仅会影响本国的国内选择，也会影响该规范接受国在国际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因为国际规范是某些国家既定身份的社会标准，而且国家的身份往往和特定行为关联，某些国家由于采取了国际规范所认可的行为就容易被认为是先进的国家，或者是国际体系中地位高的国家。^② 例如，在西周时期，鲁国国力并不强大，但由于是周公的封地，因而鲁国在诸侯国中拥有高贵的地位。^③

霸主国的出现破坏了原有的礼乐秩序。尽管成功的霸主国往往会采取尊奉周天子的战略，但是当周天子认可某国为霸主国时，霸主国就履行了一部分原属于天子的职责。^④ 在此情况下，就会出现周天子权威下移或者让渡给霸主国的情况。其他诸侯国则会在实力弱而权威高的周天子和实力强的霸主国之间面临选择，究竟更尊奉谁？在各国选择的决定机制中，除了它们追求的利益外，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避免损失、维持生存。在环境变动的情况下，若违背规范的行为受到了惩罚（sanction），则规范会得到维持。但是如果违背规范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其他国家也不坚持维护规范，规范会退化；若其他国家坚持维护规范，规范可以得到维持。^⑤ 在春秋早期，由于周天子的军事力量较弱，难以惩罚各种破坏规范的行为，此时霸主国出现，执行了原本应该由周天子执行的惩罚行动。因此，在周天子与霸主国之间，其他诸侯国可能会慢慢偏向拥有军事实力的霸主国，因为霸

① 司马光指出：“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② Ann E. Towns. “Norms and Social Hierarchies: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cy Diffusion ‘from belo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2, Vol. 66, No. 2, pp. 179-209.

③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④ 孔子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参见《论语·季氏篇》。

⑤ Diana Panke and Ulrich Petersohn, “Why International Norms Disappear Somet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4, 2012, pp. 719-774; M. Patrick Cottrell,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Replacement: The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ine Ban Trea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2, 2009, pp. 217-248.

主国的强大实力可以保障诸侯国的生存安全，而周天子难以提供这一公共产品。可见，尽管霸主国有助于维持国际秩序，但也会导致霸主国的权威上升和周天子合法性下降，进而导致旧规范的加速退化。^①

自以齐桓公为首的霸主国出现后，新的规范替代了原有的礼乐体系，与霸主国更亲近的国家可能会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拥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东周礼乐体系崩塌，导致国际社会从等级制向无政府状态演化。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不仅要寻求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支持，还可能面临着来自霸主国的防范。若周天子合法性下降，崛起国不会一直选择尊奉周天子，而是选择通过战争击败霸主国以获得霸主地位。因此，通过战争的争强模式替代尊周模式成为春秋晚期称霸的主要方式。例如，楚庄王问九鼎之轻重，这显然是不尊重周室的举动，然而，由于楚庄王战胜晋国，楚国也被公认为霸主。可见，如果周天子合法性强，崛起国获得周天子认可就可以成为霸主，权力转移导致的战争数量较少；如果周天子合法性弱，崛起国仅靠周天子认可不足以成为霸主，还需要战胜霸主国，此时，权力转移导致的战争数量较多。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若霸主国选择尊周，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尊奉可能导致合法性下移，进而导致规范退化，则周天子合法性减弱后新的崛起国选择尊周的概率下降，而会更倾向于争强模式，结果将使大国战争增多。

四、春秋时期权力转移的演化博弈模型

为了分析春秋时期权力转移中各方的选择，本文将首先构建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春秋时期争霸战的发生条件以及周天子的合法性对国际秩序的作用。随后，本文将创建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规范退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一）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的演化博弈模型

不同于传统的博弈模型，演化博弈强调的是一种动态均衡。演化博弈中的行为体在博弈前所拥有的信息和知识是有限的。在演化博弈中存在选择机制和复制动态机制，局中人的策略可以根据情况随机变化。在演化的过程中，局中

^① 孔子指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参见《论语·季氏篇》。

□ 当代亚太

人会逐渐找到对自己最有益的策略，这是一个在变化中进行选择的过程。^①

对于具体的博弈模型，笔者设定以下假设：（1）各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会根据实际情况和趋势的发展改变策略，进而选择使自己收益最大的策略，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各方无法在博弈之前预判自己的最优策略，而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整；（2）博弈是复制动态的，类似于生物的进化状态，各方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

1. 参数设定和支付矩阵

在表 1 中，笔者列出了各方在演化博弈中不同选择的收益。在表 2 中，笔者将三方的演化博弈中各方的选择和支付展示出来。

表 1 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三方演化博弈的参数设定

参数名称	参数定义
C	崛起国和霸主国爆发战争时的总成本
t ($0 < t < 1$)	崛起国和霸主国的成本分摊比例系数，崛起国所支付的战争成本为 tC ，霸主国所支付的战争成本为 $(1-t)C$
R	崛起国和霸主国爆发战争时的总收益
b ($0 < b < 1$)	崛起国和霸主国的战争收益分摊比例系数，崛起国所得的战争收益为 bR ，霸主国所得的战争收益为 $(1-b)R$
W	若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不爆发战争，即权力和平转移，则霸主国丧失霸权的损失
U	若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不爆发战争，即权力和平转移，则崛起国成为新任霸主的收益
r_1	崛起国维持和平的收益
r_2	霸主国维持和平的收益
L	周天子给予的支持会使崛起国或者霸主国获得额外的收益
P	周天子的惩罚会使崛起国或者霸主国受到的损失
D	周天子给予争霸一方合法性后让渡一定的权力，对自身造成的损失
r_3	周天子维持和平的收益
C_2	周天子惩罚一方时的成本
R_2	周天子惩罚一方时的收益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赫伯特·金迪斯：《演化博弈论：问题导向的策略互动模型》，王新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表 2 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三方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崛起国	霸主国	
			对崛起国发动战争 (概率 z)	争取合法性/周天子支持 (概率 $1-z$)
周天子	接受尊奉周天子的大国称霸 (概率 x)	直接发动战争挑战霸主国 (概率 y)	双边战争爆发, 周天子不给任何一方合法性 $r_3, bR-tC, (1-b)R-(1-t)C$	双边战争爆发, 周天子支持霸主国 $r_3-D, bR-tC, (1-b)R-(1-t)C+L$
		争取周天子认可 (概率 $1-y$)	双边战争爆发, 周天子支持崛起国 $r_3-D, bR-tC+L, (1-b)R-(1-t)C$	不发生战争, 周天子选择支持一方 r_3-D, r_1+U, r_2-W
	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 (概率 $1-x$)	直接发动战争挑战霸主国 (概率 y)	三边战争爆发, 周天子惩罚双方 $R_2-2C_2, bR-tC-P, (1-b)R-(1-t)C-P$	三边战争爆发, 周天子惩罚崛起国 $R_2-C_2, bR-tC-P, (1-b)R-(1-t)C$
		争取周天子认可 (概率 $1-y$)	三边战争爆发, 周天子惩罚霸主国 $R_2-C_2, bR-tC, (1-b)R-(1-t)C-P$	不发生战争 r_3, r_1+U, r_2-W

说明: 表中每个框内的支付, 第一部分为周天子的支付, 第二部分为崛起国的支付, 第三部分为霸主国的支付

资料来源: 同表 1

2. 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求解

根据支付矩阵可知, 周天子在博弈时选择“接受尊奉周天子的大国称霸”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x1} , 选择“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x2} , 平均期望收益为 \overline{U}_x 。

$$U_{x1} = yzr_3 + y(1-z)(r_3 - D) + z(1-y)(r_3 - D) + (1-y)(1-z)(r_3 - D);$$

$$U_{x2} = yz(R_2 - 2C_2) + y(1-z)(R_2 - C_2) + z(1-y)(R_2 - C_2) + (1-y)(1-z)r_3;$$

$$\overline{U}_x = xU_{x1} + (1-x)U_{x2}$$

崛起国在博弈时选择“直接发动战争挑战霸主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y1} , 选择“争取周天子认可”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y2} , 平均期望收益为 \overline{U}_y 。

□ 当代亚太

$$U_{y1} = xz (bR - tC) + x (1 - z) (bR - tC) + z (1 - x) (bR - tC - P) + (1 - x) (1 - z) (bR - tC - P);$$

$$U_{y2} = xz (bR - tC + L) + x (1 - z) (r_1 + U) + z (1 - x) (bR - tC) + (1 - x) (1 - z) (r_1 + U);$$

$$\bar{U}_y = yU_{y1} + (1 - y) U_{y2}$$

霸主国在博弈时选择“对崛起国发动战争”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z1} ，选择“争取合法性/周天子支持”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z2} ，平均期望收益为 \bar{U}_z 。

$$U_{z1} = xy [(1 - b) R - (1 - t) C] + x (1 - y) [(1 - b) R - (1 - t) C] + y (1 - x) [(1 - b) R - (1 - t) C - P] + (1 - x) (1 - y) [(1 - b) R - (1 - t) C - P];$$

$$U_{z2} = xy [(1 - b) R - (1 - t) C + L] + x (1 - y) (r_2 - W) + y (1 - x) [(1 - b) R - (1 - t) C] + (1 - x) (1 - y) (r_2 - W);$$

$$\bar{U}_z = zU_{z1} + (1 - z) U_{z2}$$

根据 Malthusian 动态方程，可以分别构建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的复制动态方程。^①

$$F(x) = \frac{dx}{dt} = x (U_{x1} - \bar{U}_x) = x (1 - x) [yz (-r_3 + R_2 + D) + (y + z) (r_3 - R_2 + C_2) - D];$$

$$F(y) = \frac{dy}{dt} = y (U_{y1} - \bar{U}_y) = y (1 - y) [-xzL + xP - z (bR - tC - r_1 - U) + (bR - tC - P - r_1 - U)];$$

$$F(z) = \frac{dz}{dt} = z (U_{z1} - \bar{U}_z) = z (1 - z) \{-xyL + xP - y [(1 - b) R - (1 - t) C - r_2 + W] + [(1 - b) R - (1 - t) C - P - r_2 + W]\}$$

在非对称的演化博弈中，均衡策略为纯策略均衡，^② 因此，可以在下面的分析中排除混合策略。

由 $F(x) = 0$ ， $F(y) = 0$ ， $F(z) = 0$ ，得到 8 个纯策略均衡点：

① Oded Galor and David N. Weil,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4, 2000, pp. 806-828.

② Reinhard Selten, “A Note on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in Asymmetric Animal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84, No. 1, 1980, pp. 93-101.

$E_1 (0, 0, 0)$, $E_2 (0, 0, 1)$, $E_3 (0, 1, 0)$, $E_4 (1, 0, 0)$, $E_5 (0, 1, 1)$, $E_6 (1, 0, 1)$, $E_7 (1, 1, 0)$, $E_8 (1, 1, 1)$

3. 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首先, 需要求解雅各比矩阵及其特征值。

$$J =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 F(x)}{\partial x} & \frac{\partial F(x)}{\partial y} & \frac{\partial F(x)}{\partial z} \\ \frac{\partial F(y)}{\partial x} & \frac{\partial F(y)}{\partial y} & \frac{\partial F(y)}{\partial z} \\ \frac{\partial F(z)}{\partial x} & \frac{\partial F(z)}{\partial y} & \frac{\partial F(z)}{\partial z} \end{bmatrix}$$

$$F(x) = \frac{dx}{dt} = x(U_{x1} - \bar{U}_x) = x(1-x) [yz(-r_3 + R_2 + D) + (y+z)(r_3 - R_2 + C_2) - D];$$

$$F(y) = \frac{dy}{dt} = y(U_{y1} - \bar{U}_y) = y(1-y) [-xzL + xP - z(bR - tC - r_1 - U) + (bR - tC - P - r_1 - U)];$$

$$F(z) = \frac{dz}{dt} = z(U_{z1} - \bar{U}_z) = z(1-z) \{-xyL + xP - y[(1-b)R - (1-t)C - r_2 + W] + [(1-b)R - (1-t)C - P - r_2 + W]\}$$

其次, 需要计算雅各比矩阵中的各分量。

$$\frac{\partial F(x)}{\partial x} = (1-2x) [yz(-r_3 + R_2 + D) + (y+z)(r_3 - R_2 + C_2) - D]; \quad \frac{\partial F(x)}{\partial y} = x(1-x) [z(-r_3 + R_2 + D) + r_3 - R_2 + C_2];$$

$$\frac{\partial F(x)}{\partial z} = x(1-x) [y(-r_3 + R_2 + D) + r_3 - R_2 + C_2];$$

$$\frac{\partial F(y)}{\partial x} = y(1-y)(-zL + P); \quad \frac{\partial F(y)}{\partial y} = (1-2y) [-xzL + xP - z(bR - tC - r_1 - U) + (bR - tC - P - r_1 - U)]; \quad \frac{\partial F(y)}{\partial z} = y(1-y)(-xL - bR + tC + r_1 + U);$$

$$\frac{\partial F(z)}{\partial x} = z(1-z)(-yL + P); \quad \frac{\partial F(z)}{\partial y} = z(1-z) [-xL - (1-b)R + (1-t)C + r_2 - W]; \quad \frac{\partial F(z)}{\partial z} = (1-2z) \{-xyL + xP - y[(1-b)R - (1-t)C - r_2 + W] + [(1-b)R - (1-t)C - P - r_2 + W]\}$$

□ 当代亚太

当雅可比矩阵满足行列式 $\det J > 0$ 且迹 $\text{tr} J < 0$, 则复制动态方程的均衡点即为 ESS (演化稳定策略)。我们可以用李雅普诺夫判别法 (间接法) 进行判定。具体为, 当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 $\lambda < 0$ 时, 该均衡点是渐近稳定点; 当雅可比矩阵中所有特征值 $\lambda > 0$ 时, 该均衡点是不稳定点; 当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 λ 中有正有负时, 该均衡点是不稳定点, 此时为鞍点。例如, 对于均衡点 $E_1 (0, 0, 0)$, 当 $\lambda_1 < 0, \lambda_2 < 0$ 且 $\lambda_3 < 0$ 时, $E_1 (0, 0, 0)$ 是渐近稳定点。求解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三方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结果

均衡点	特征值	稳定性
$E_1 (0, 0, 0)$	$\lambda_1 = -D < 0$ $\lambda_2 = bR - tC - p - r_1 - U$ $\lambda_3 = (1-b)R - (1-t)C - P - r_2 + W$	稳定条件: $bR - tC < p + r_1 + U$ $(1-b)R - (1-t)C < P + r_2 - W$
$E_2 (0, 0, 1)$	$\lambda_1 = r_3 - R_2 + C_2 - D$ $\lambda_2 = -P < 0$ $\lambda_3 = - (1-b)R + (1-t)C + P + r_2 - W$	稳定条件: $r_3 - D < R_2 - C_2$ $P + r_2 - W < (1-b)R - (1-t)C$
$E_3 (0, 1, 0)$	$\lambda_1 = r_3 - R_2 + C_2 - D$ $\lambda_2 = -bR + tC + P + r_1 + U$ $\lambda_3 = -P < 0$	稳定条件: $r_3 - D < R_2 - C_2$ $P + r_1 + U < bR - tC$
$E_4 (1, 0, 0)$	$\lambda_1 = D > 0$ $\lambda_2 = bR - tC - r_1 - U$ $\lambda_3 = (1-b)R - (1-t)C - r_2 + W$	不稳定
$E_5 (0, 1, 1)$	$\lambda_1 = r_3 - R_2 + 2C_2$ $\lambda_2 = P > 0$ $\lambda_3 = P > 0$	不稳定
$E_6 (1, 0, 1)$	$\lambda_1 = -r_3 + R_2 - C_2 + D$ $\lambda_2 = -L < 0$ $\lambda_3 = - (1-b)R + (1-t)C + r_2 - W$	稳定条件: $R_2 - C_2 < r_3 - D$ $r_2 - W < (1-b)R - (1-t)C$
$E_7 (1, 1, 0)$	$\lambda_1 = -r_3 + R_2 - C_2 + D$ $\lambda_2 = -bR + tC + r_1 + U$ $\lambda_3 = -L < 0$	稳定条件: $R_2 - C_2 < r_3 - D$ $r_1 + U < bR - tC$
$E_8 (1, 1, 1)$	$\lambda_1 = -r_3 + R_2 - 2C_2$ $\lambda_2 = L > 0$ $\lambda_3 = L > 0$	不稳定

资料来源: 同表 1

4.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上表中的演化博弈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无论在何种条件下， $E_4(1, 0, 0)$ 、 $E_5(0, 1, 1)$ 和 $E_8(1, 1, 1)$ 这三个均衡点都不稳定，因此，模型不会演化到这三种情况。

其次，当 $bR - tC < p + r_1 + U$ 且 $(1-b)R - (1-t)C < P + r_2 - W$ 时， $E_1(0, 0, 0)$ 为稳定均衡点，即周天子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崛起国争取周天子认可，霸主国争取周天子认可。这种情况下，权力从霸主国到崛起国可实现和平转移。当 $r_3 - D < R_2 - C_2$ 且 $P + r_2 - W < (1-b)R - (1-t)C$ 时， $E_2(0, 0, 1)$ 为稳定均衡点，即周天子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崛起国争取周天子认可，霸主国主动发动战争。这种情况下，霸主国主动发动战争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而周天子会选择惩罚霸主国。当 $r_3 - D < R_2 - C_2$ 且 $P + r_1 + U < bR - tC$ 时， $E_3(0, 1, 0)$ 为稳定均衡点，即周天子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崛起国主动发动战争，霸主国争取周天子认可。这种情况下，崛起国主动发动战争挑战霸主国，而周天子会选择惩罚崛起国。当 $R_2 - C_2 < r_3 - D$ 且 $r_2 - W < (1-b)R - (1-t)C$ 时， $E_6(1, 0, 1)$ 为稳定均衡点，即周天子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崛起国争取周天子认可，霸主国主动发动战争。这种情况下，霸主国主动发起战争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而周天子接受崛起国的尊奉并支持其争霸。当 $R_2 - C_2 < r_3 - D$ 且 $r_1 + U < bR - tC$ 时， $E_7(1, 1, 0)$ 为稳定均衡点，即周天子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崛起国主动发动战争，霸主国争取周天子认可。这种情况下，崛起国主动发起战争挑战霸主国，而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霸主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有效检验假设 1。在“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三方博弈中，当 $bR - tC < p + r_1 + U$ 且 $(1-b)R - (1-t)C < P + r_2 - W$ 时， $E_1(0, 0, 0)$ 为稳定均衡点，也就是说，如果周天子选择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崛起国和霸主国都会选择争取周天子认可的方式。从霸主国到崛起国的权力转移会实现和平过渡。这检验了假设 1 中的“如果两国都采用尊周的模式，则战争概率较小”的判断。而当 $r_3 - D < R_2 - C_2$ 且 $P + r_1 + U < bR - tC$ 时， $E_3(0, 1, 0)$ 为稳定均衡点，即使周天子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崛起国仍可能主动发动战争挑战霸主国，这种情况下会爆发权力转移战争。然而，周朝军事实力较弱，难以确保对诸侯国的征伐获胜，例如，周昭

□ 当代亚太

王在征伐楚国时就以中途丧生而告终。^① 因此, 进入东周时期后, 周天子囿于军事力量, 较少征伐。故而周天子往往选择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 这种情况下, 两个均衡点 $E_6(1, 0, 1)$ 和 $E_7(1, 1, 0)$ 都是霸主国或崛起国中一方挑起战争的情况。这检验了假设 1 中的“如果两国都采用争强模式, 则战争概率较大”的说法。

(二) 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的演化博弈模型

1. 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

这一组演化博弈的模型假设与上一组相同, 即“有限理性”和“复制动态”假设。我们也可以进而得出其支付矩阵。

表 4 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演化博弈参数设定

参数名称	参数定义
S_1	霸主国对周天子的支持
S_2	诸侯国对周天子的支持, 且 $S_1 > S_2$
W_1	周天子的战争成本
q	周天子的日常约束成本, 趋近于 0
S_3	其他诸侯国对霸主国的支持
F	霸主国从周天子处得到的合法性, 即当其他诸侯国也尊奉周天子时, 周天子所能给予的合法性更大
f	霸主国从周天子处得到的部分合法性, 即当其他诸侯国不尊奉周天子时, 周天子所能给予的合法性更小
e	霸主国的声誉成本
W_2	霸主国的战争成本
H	诸侯国得到霸主国的保护
D	周天子给予诸侯国的身份地位
T	诸侯国追随霸主国的参战风险和各类成本
A	诸侯国需要选边站队时, 如果不选霸主国所受到的惩罚
B	诸侯国需要选边站队时, 如果不选周天子所受到的惩罚

资料来源: 同表 1

^①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表 5 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霸主国	其他诸侯国	
			既尊奉周天子也接受霸主国的霸权 (概率 z)	只接受霸主国的领导 (概率 $1-z$)
周天子	不约束霸主国 (概率 x)	外交政策以战争为主 (概率 y)	周天子只获得其他诸侯国支持, 不约束霸主国; 霸主国获得其他诸侯国支持, 但不尊奉周天子; 诸侯国得到霸主国安全保障和周天子给予的合法身份 $S_2, S_3 - e, H + D - T$	周天子没有获得任何支持; 霸主国获得其他诸侯国支持; 其他诸侯国只得到霸主国安全保障 $0, S_3, H - T$
		外交政策以尊周为主 (概率 $1-y$)	周天子同时获得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支持; 霸主国得到合法性和其他诸侯国支持; 各诸侯国得到霸主国的安全保障和周天子给予的合法身份 $S_1 + S_2, S_3 + F, H + D$	周天子获得霸主国支持; 霸主国得到各诸侯国支持; 各诸侯国得到霸主国的安全保障 $S_1, S_3 + f, H$
	约束霸主国 (概率 $1-x$)	外交政策以战争为主 (概率 y)	周天子得到诸侯国支持; 霸主国获得诸侯国支持; 诸侯国以概率 p 帮助周天子或者霸主国 $S_2 - W_1 - q, S_3 - W_2 - e, -T + p(H - B) + (1 - p)(D - A)$	周天子没有获得霸主国和诸侯国的支持; 霸主国获得诸侯国支持; 诸侯国得到霸主国安全保障 $-W_1 - q, S_3 - W_2, H - T - B$
		外交政策以尊周为主 (概率 $1-y$)	周天子同时获得霸主国和诸侯国支持; 霸主国得到合法性和诸侯国支持; 诸侯国得到霸主国的安全保障和周天子给予的合法身份 $S_1 + S_2 - q, S_3 + F, H + D$	周天子得到霸主国支持; 霸主国得到诸侯国支持和部分合法性; 诸侯国得到霸主国的安全保障 $S_1 - q, S_3 + f, H$

说明: 表中每个框内的支付, 第一部分为周天子的支付, 第二部分为霸主国的支付, 第三部分为其他诸侯国的支付

资料来源: 同表 1

2. 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求解

根据支付矩阵可知, 周天子在博弈时选择“不约束霸主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x1} , 选择“约束霸主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x2} , 平均期望收益为 \bar{U}_x 。

□ 当代亚太

$$U_{x1} = yz S_2 + y(1-z)0 + z(1-y)(S_1 + S_2) + (1-y)(1-z)S_1;$$

$$U_{x2} = yz(S_2 - W_1 - q) + y(1-z)(-W_1 - q) + z(1-y)(S_1 + S_2 - q) + (1-y)(1-z)(S_1 - q);$$

$$\bar{U}_x = xU_{x1} + (1-x)U_{x2}$$

霸主国在博弈时选择“外交政策以战争为主”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y1} ，选择“外交政策以尊周为主”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y2} ，平均期望收益为 \bar{U}_y 。

$$U_{y1} = xz(S_3 - e) + x(1-z)S_3 + z(1-x)(S_3 - W_2 - e) + (1-x)(1-z)(S_3 - W_2);$$

$$U_{y2} = xz(S_3 + F) + x(1-z)(S_3 + f) + z(1-x)(S_3 + F) + (1-x)(1-z)(S_3 + f);$$

$$\bar{U}_y = yU_{y1} + (1-y)U_{y2}$$

追随霸主国的诸侯国在博弈时选择“既尊奉霸主国又尊奉周天子”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_{z1} ，选择“只接受霸主国的领导”的期望收益为 U_{z2} ，平均期望收益为 \bar{U}_z 。

$$U_{z1} = xy(H + D - T) + x(1-y)(H + D) + y(1-x)[-T + p(H - B) + (1-p)(D - A)] + (1-x)(1-y)(H + D);$$

$$U_{z2} = xy(H - T) + x(1-y)H + y(1-x)(H - T - B) + (1-x)(1-y)H;$$

$$\bar{U}_z = zU_{z1} + (1-z)U_{z2}$$

计算三者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F(x) = \frac{dx}{dt} = x(U_{x1} - \bar{U}_x) = x(1-x)(W_1y + q);$$

$$F(y) = \frac{dy}{dt} = y(U_{y1} - \bar{U}_y) = y(1-y)[xW_2 + z(f - e - F) - W_2 - f];$$

$$F(z) = \frac{dz}{dt} = z(U_{z1} - \bar{U}_z) = z(1-z)[xyD - yD + D + (1-x)y(1-p)(D - A - H + B)]$$

由 $F(x) = 0$ ， $F(y) = 0$ ， $F(z) = 0$ ，得到 8 个纯策略均衡点：

$$E_1(0, 0, 0), E_2(0, 0, 1), E_3(0, 1, 0), E_4(1, 0, 0), E_5(0, 1, 1), E_6(1, 0, 1), E_7(1, 1, 0), E_8(1, 1, 1)$$

3. 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计算雅各比矩阵中的各分量如下：

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 □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F(x)}{\partial x} &= (1-2x)(W_1y+q); \quad \frac{\partial F(x)}{\partial y} = x(1-x)W_1; \quad \frac{\partial F(x)}{\partial z} = 0; \\ \frac{\partial F(y)}{\partial x} &= y(1-y)W_2; \quad \frac{\partial F(y)}{\partial y} = (1-2y)[xW_2+z(f-e-F) - \\ &W_2-f]; \quad \frac{\partial F(y)}{\partial z} = y(1-y)(f-e-F); \\ \frac{\partial F(z)}{\partial x} &= z(1-z)(yD-y(1-p)(D-A-H+B)); \quad \frac{\partial F(z)}{\partial y} = z \\ &(1-z)[xD-D+(1-x)(1-p)(D-A-H+B)]; \quad \frac{\partial F(z)}{\partial z} = (1-2z) \\ &[xyD-yD+D+(1-x)y(1-p)(D-A-H+B)] \end{aligned}$$

根据计算结果，笔者在表 6 给出了第二个模型的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表 6 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结果

均衡点	特征值	稳定性
$E_1(0, 0, 0)$	$\lambda_1=q>0; \lambda_2=-W_2-f; \lambda_3=D>0$	不稳定
$E_2(0, 0, 1)$	$\lambda_1=q>0; \lambda_2=-e-F-W_2<0; \lambda_3=-D<0$	不稳定
$E_3(0, 1, 0)$	$\lambda_1=W_1+q>0; \lambda_2=W_2+f>0; \lambda_3=(1-p)(D-A-H+B)$	不稳定
$E_4(1, 0, 0)$	$\lambda_1=-q<0; \lambda_2=-f<0; \lambda_3=D>0$	不稳定
$E_5(0, 1, 1)$	$\lambda_1=W_1+q>0; \lambda_2=W_2+e+F>0; \lambda_3=-[(1-p)(D-A-H+B)]$	不稳定
$E_6(1, 0, 1)$	$\lambda_1=-q<0; \lambda_2=-e-F<0; \lambda_3=-D<0$	稳定
$E_7(1, 1, 0)$	$\lambda_1=-W_1-q<0; \lambda_2=f>0; \lambda_3=D>0$	不稳定
$E_8(1, 1, 1)$	$\lambda_1=-W_1-q<0; \lambda_2=e+F>0; \lambda_3=-D<0$	不稳定

资料来源：同表 1

4. 模型结果分析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第二个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非常不稳定，只有一个稳定点 $E_6(1, 0, 1)$ ，即周天子选择不约束霸主国，霸主国选择尊周来获得合法性，而其他诸侯国选择同时尊奉霸主国和周天子。影响周天子选择的主要因素是日常约束成本 q ，当霸主国选择战争的时候，影响周天子选择的还有战争成本 W_1 ；影响霸主国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合法性 F ， f 和声誉成本 e ；影响诸侯国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周天子给予的身份地位 D 。

上述三方博弈模型只有一个稳定点 $E_6(1, 0, 1)$ ，非常不稳定。在现实中表现为，在春秋时期，在只有一个霸主国的时候，如果霸主国选择尊

□ 当代亚太

周，周天子倾向于选择不约束霸主国，而诸侯国选择同时尊奉周天子和霸主国，体系可以暂时维持稳定。但是由于周天子难以有力约束霸主国，自身合法性下降，导致霸主国越来越容易侵蚀周天子的权威，而其他诸侯国在周天子和霸主国之间也容易越来越偏向霸主国，整个体系进入不稳定状态。此时，如果出现一个崛起国来挑战霸主国，国际体系的博弈会很快进入周天子—崛起国—霸主国之间的三方博弈。由于周天子的合法性削弱趋势不容易逆转，同时周朝兵力较弱，很难选择“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策略，因此，周天子往往会选择“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策略，此时，周天子、崛起国、霸主国三方博弈的稳定解就是“周天子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崛起国争取周天子认可，霸主国主动发动战争”，或“周天子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崛起国主动发动战争，霸主国争取周天子认可”。显然，这两个稳定解都是战争状态。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春秋时期，伴随礼崩乐坏的是战争规模和数量都增加，也同时印证了假设2的判断——“若霸主国选择尊周，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尊奉可能导致合法性下移，进而导致规范退化，则周天子合法性减弱后新的崛起国选择尊周的概率下降，结果将使大国战争增多”。

五、有关春秋霸主的案例比较

以下将对春秋时期齐国称霸、晋国称霸、晋国分别与秦国、楚国之间的历次权力转移为案例进行分析，进而对前文的两个假设进行验证，分析周天子、崛起国、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的互动对国际规范以及体系内战争的影响。目前，历史学家们对于春秋时期到底存在哪几位霸主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宋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都属于春秋霸主。^①然而，虽然宋襄公曾经在齐国霸权衰落之后谋求霸主地位，却因为实力较弱没有实现。而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对中原的核心地区所能造成的影

^① 司马贞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索隐》中指出：“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荀子·王霸》一书指出：“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墨子·所染》一书指出：“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响有限。因此，本文将只分析四位更为公认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探究他们称霸时期的权力转移与冲突纠葛。

本文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主国和崛起国概念应用于分析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存在共性。春秋时期的霸主国是针对王道和霸道的区分而言的。王道重视道德，霸道则实力和道德兼顾。^①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国（hegemony）是从实力和地位的角度界定的。^②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霸主”与当前国际关系话语中的“霸权国”都是从实力和地位角度加以判别的，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国家。因此，本文选择权力转移理论中霸主国与崛起国互动的视角来解读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是具备合理性的。当然，当前的权力转移理论主要植根于欧美历史，其模式探究和结论辨析可能有失偏颇。在西方经验中，霸主国为维持地位可能会主动遏制崛起国，容易导致大规模战争爆发，这场大战的获胜者即是新霸主。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则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春秋中后期，晋国、楚国和秦国都具备强大实力，这三个国家能够成功称霸，除了获得大战胜利，还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周天子的认可。因此，笔者希望借助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经验补益我们对权力转移与战争关系的认知。

（一）齐国称霸

齐桓公是春秋首霸。在齐桓公之前，郑庄公时期的郑国也曾拥有较为强大的实力。如前所述，郑国试图以挑衅周天子地位的方式得到霸权，然而没有成功。究其原因，除了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内部权力纠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郑庄公对周王朝不敬，导致郑国无法获得称霸的合法性。周平王东迁之后，虽然周天子的权力旁落，但在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依然遵守周礼，只有尊奉周天子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其他诸侯国家的认可，否则将会受到其他诸侯国的谴责，支付昂贵的声誉成本。然而，郑庄公没有意识到这一

^① 孟子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参见《孟子·公孙丑上》。阎学通教授认为，霸主国和崛起国存在三种领导类型——王权、霸权和强权，参见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8页。

^② Emilio Casetti, “Power Shif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will China Overtake the US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0, No. 6, 2003, pp. 661-675; Kelly Kadera and Gerald Soroki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0, No. 3, 2004, pp. 211-230; Carsten Rauch, “Challenging the Power Consensus: GDP, CINC,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4, 2017, pp. 642-664.

□ 当代亚太

点，他没有选择通过尊奉周天子来获得合法性，而是试图与当时的周平王平起平坐。

公元前 713 年，郑庄公借声讨宋国不朝周天子之罪，联合齐、鲁师伐宋。然而，此次讨伐并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授权，因此周天子免去了郑庄公的卿士之位。此举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郑庄公甚至派人去收割周王室境内的麦子。为了缓解矛盾、增加互信，公元前 720 年，郑庄公和周平王决定交换质子，史称“周郑交质”。^① 然而，这意味着郑庄公将自己与周天子摆在同等的地位，实质上是一种僭越。^② 公元前 707 年，周桓王统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讨伐郑国，周师大败，周桓王受伤，郑国成为小霸。然而，“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③ 郑庄公只是靠武力征服的方式上位，没有合法性根基，当郑庄公去世后，郑国地位迅速衰落，甚至在晋楚争霸进程中成为两强争夺的棋子。

与郑庄公不尊周室的做法相反，受到管仲“顺天而行”^④“布德诸侯”^⑤等思想的影响，齐桓公率先提出“尊王攘夷”的战略，顺利成为春秋首霸。齐桓公在外交中践行了“尊王”原则。周朝自从周武王时期就建立了统治天下的中央政权。^⑥ 周朝建国后采用分封制，分封各地封邑给诸侯。^⑦ 分封制将血缘宗法关系与诸侯统治相结合。其中，周天子是天下共主，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的庶子被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庶子被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定期朝见天子，以确保周王室政令在天下的推行。^⑧ 因此，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将诸侯与周天子密切联系起来。周天子对齐桓公的认可使其他诸侯国也愿意接受齐国的领导，故而齐桓公顺利地获得了合法性。尊王攘夷的策略是借尊

① 左丘明：《左传·隐公三年》，“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② 张胡玲：《两汉质子制度在外交中的应用——人质外交》，载《华夏文化》2015 年第 1 期，第 53~55 页。

③ 司马迁：《史记·郑世家》。

④ 《管子·形势》一书中写道：“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

⑤ 《管子·霸言》一书中写道：“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

⑥ 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 页。

⑦ 同上，第 77 页。

⑧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一书中记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覲，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饯曰视。”；《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行人》记载朝覲时写道：“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周王之名，讨伐夷狄，维护中原正统，帮助齐国提升了崛起合法性。齐桓公称霸的举措既遵守当时的主流规范，^① 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② 受到普遍认可，^③ 从而成功规避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安全困境。^④

齐国的对外政策以会盟为主。周惠王宠爱次子姬带，周太子姬郑存在继位危机。此时，齐国发起首止会盟，齐、宋、鲁、陈、卫、郑、许、曹八国诸侯参加，并邀请周太子姬郑与会。此后，周惠王驾崩时，以齐国为首的前述八国军队朝见天子，确保太子姬郑顺利继任为周襄王。公元前 651 年，齐国与宋、鲁、卫、许、曹、陈等国朝见天子后，达成葵丘之盟。盟约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周天子也参加了这次会盟，使齐桓公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巅峰，齐桓公真正成为公认的霸主。^⑤ 在葵丘会盟上，齐桓公明确了尊奉周天子的策略，号召所有诸侯国“尊王”，在周天子的王权体系内建立自己的霸权。周襄王给予齐桓公最高的赏赐，支持齐桓公在诸侯国中的领导地位。齐桓公会盟不是单纯依靠军力，同时也解决了各国面临的内乱问题，受到孔子的认可。^⑥

除了“尊王”之外，齐桓公在军事领域的主要举措为“攘夷”。^⑦ 齐桓公称霸也是大规模扩张和兼并的进程，“并国三十五”，^⑧ “启地三千里”。^⑨ 齐

① 戈达德指出，普鲁士的“合法化战略”就是自我克制并遵守当时的国际规范，从而成功避免了英国制衡。参见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3, 2008/09, pp. 110-142.

② 吉尔平认为，获得霸权合法性的三个前提是：获得霸权战争胜利、提供“公共产品”和价值观上的吸引力。参见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4. 约瑟夫·奈认为，国际政治领导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见 Joseph S. Nye, Jr.,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 Vol. 50, No. 1, 2008, pp. 55-68.

③ 《论语·宪问》中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④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⑤ 左丘明：《左传·僖公九年》中写道：“周公、鲁僖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葵丘。”

⑥ 《论语·宪问》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⑦ 参见王日华：《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⑧ 《荀子·仲尼》。

⑨ 《韩非子·有度》。

□ 当代亚太

国主要的攻击对象是中原之外的戎、狄等地，因为这些化外之地经常攻击中原。例如，周幽王时期，由于西戎进攻周都镐京，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因此，攻打戎、狄等地的举措受到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普遍支持。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64 年），山戎入侵燕国，燕庄公向齐桓公求救。齐桓公出兵帮助燕国，并把击败山戎获得的北方五百余里地送给燕国，其结果是“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① 公元前 660 年，狄人攻打卫国和邢国。齐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659 年），齐、宋、曹联军救邢。“邢迁如归，卫国忘亡”。^② 齐桓公的霸权地位更加巩固。“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③ “令固始行于天下矣”。^④ 除了北方的戎、狄之外，南方的楚国也多次侵扰郑国等中原国家，齐桓公在犂地与鲁、宋、郑、邾等国举行了犂之盟，谋划应对楚国。之后，管仲率盟军到楚界，以楚国没有给周室交纳进贡的包茅为由攻打楚国。^⑤ 对于齐国的指责，楚国表示接受并改过。^⑥ 然而，齐国并没有撤兵，对于齐国炫耀武力的行为，楚国使臣表示如果齐国以武力强制诸侯服从，楚国不会接受。如果齐国以德绥诸侯，楚国才会接受。^⑦ 可见，合法性对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齐国以楚国没有进贡周室的理由进行讨伐，楚国不得不接受，结果是“齐、鲁、宋、陈、卫、郑，许、曹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⑧

上述结果验证了前文演化博弈的推演。郑国违逆了春秋早期的国际规范，因此无法从周天子处获得合法性，进而无法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在前文关于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的三方博弈中，如果霸主国没有选择尊奉周天子，模型的演化结果将不稳定，这一结果与郑国未能称霸的事实相

① 赵蕤：《长短经·臣行第十》。

② 左丘明：《左传·闵公二年》。

③ 左丘明：《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

④ 《管子·霸形》。

⑤ 齐国的指责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四年》。

⑥ 楚国使臣的回应是：“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四年》。

⑦ 据《左传》记载，双方对话如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四年》。

⑧ 左丘明：《左传·僖公四年》。

符。齐桓公的争霸战略为其他诸侯提供了成功经验，通过尊王攘夷获得合法性成为齐国之后各霸主的通用模式。齐国称霸的历程再度验证了前文周天子、霸主国、其他诸侯国三方博弈的均衡解。周天子选择了不约束霸主国，认可齐国的霸主地位；齐国选择尊奉周天子，提出“尊王攘夷”；其他诸侯国同时尊奉周天子和齐国。这一结果是比较稳定的，只要霸主国能给予诸侯国所需要安全保障，就可以维持体系稳定。然而，随着齐桓公去世，齐国实力衰弱，齐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冲击。其他大国学习齐国模式成功成为新的霸主，霸权体系成了春秋时期维护秩序的主要机制。

（二）晋国崛起与齐晋权力转移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的霸权衰落。宋襄公曾想效仿齐桓公，通过会盟和尊奉周天子来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对于齐国内乱，宋襄公联合其他诸侯加以平定，将齐孝公扶上了齐君之位。此次成功干涉之后，宋襄公希望成为齐桓公之后的新霸主。然而，楚国实力强于宋国，对宋襄公以霸主自居的做法不满。公元前 638 年，楚、宋爆发泓水之战，宋襄公失败被俘。^① 泓水之战导致宋国的崛起之路彻底失败。楚国地位上升，之前齐国的盟国如鲁、卫、宋、郑、陈、蔡、许、曹等转而站在楚国一边。^② 虽然楚国在当时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但是长期以来被视为体系外的蛮夷国家，楚成王无法得到诸侯国的认可和周天子的支持，因此也没有成功成为第二任霸主。^③

在齐国衰落、诸侯争雄的时期，晋国开始崛起。公元前 636 年，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成功回国，成为晋文公。与齐桓公相似，晋文公也实施了“尊王攘夷”的策略。由于晋国是姬姓国家，在血缘上和周天子更亲近，晋文公也愿意通过尊奉周天子来获得合法性。公元前 636 年，周襄王弟弟王子带从狄借兵发起动乱。周襄王逃难于郑国，并向各诸侯国求救。此时秦穆公屯兵于黄河边，将要勤王。但是看到晋文公准备出兵后，秦穆公将功劳留给晋文公，班师回国。公元前 635 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死王子姬带，朝见周襄王，获得了周天子赏赐的封地。^④ 但是晋文公对春秋时期礼制体系

① 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

②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5 页。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016 年版。

④ 《左传》中写道：“晋文公勤王，三月，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 当代亚太

的尊奉程度不及齐桓公。城濮之战后，周王与会，“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①可见，晋文公对周天子的尊重远不及齐桓公，甚至遭到孔子的批评。在晋文公“勤王”后，周襄王问晋文公所需赏赐时，晋文公表示希望死后可用王礼安葬。这是僭越，周襄王表示不敢修改礼法，而是选择把王畿之内的温、原、樊、攸茅四个城邑赐给晋文公。^②

笔者根据《春秋》和《左传》的记载统计，晋文公在位9年，一共发动了9次战争。^③其中，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是晋文公称霸的标志性事件。^④楚成王四处扩张，郑、陈、蔡、许、卫、曹等国先后依附于楚。宋国不肯依附楚国，受到楚成王率楚国大军与陈、蔡、郑、许四国兵马的联合征伐。在宋国向晋国求救后，晋国派兵救援，晋、楚两国正面开战。为了确保在城濮之战中获胜，晋国与齐、秦结盟从而获得两国援兵。城濮之战获胜后，晋国召开践土会盟，宋成公、齐昭公、鲁僖公、陈穆公、蔡庄侯等赴会。周襄王祝贺并用策书任命晋文公，让晋文公安抚四方诸侯“敬服王命，以绥四国”。^⑤晋文公霸业得到天下认可。

晋文公在位期间的会盟次数少于齐桓公，共举行了3次。^⑥第一次是践土会盟，主要动机是城濮之战后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⑦同年冬天举行了第二次会盟，试图讨伐不服从晋国的诸侯国。^⑧公元前631年，晋国召开第三次会盟，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宜，因为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左右摇摆。^⑨齐桓公的会盟多是解决各国面临的威胁等事宜，而晋文公的会盟动机多与本国利

① 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② 左丘明：《国语·周语中》“襄王不许请隧”。

③ 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120页。

④ 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⑤ 据《左传》记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⑥ 参见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

⑦ 据《左传》记载：“五月，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盟于践土。”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⑧ 据《左传》记载：“冬，晋、鲁、齐、宋、蔡、郑、陈、莒、邾、秦会于温。”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⑨ 据《左传》记载：“夏六月，王室士卿、鲁僖公、晋、宋、齐、陈、秦等国大夫盟于翟泉。”参见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益有关，可见，作为新任霸主，晋文公在诸侯间的号召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上均不及齐桓公。

从国际权力格局看，不同于齐桓公称霸时的一枝独秀，晋文公在称霸阶段面临楚国和秦国崛起的挑战。根据前文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的三方博弈，齐晋权力转移是和平进程，在晋国崛起阶段，齐国与晋国之间没有爆发过正面战争。这一点符合模型的演化结果，当 $bR - tC < p + r_1 + U$ 且 $(1 - b)R - (1 - t)C < P + r_2 - W$ 时， $E_1(0, 0, 0)$ 为稳定均衡点，即周天子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崛起国争取周天子认可，霸主国争取周天子认可。此时，齐国由于内乱实力下降，无力遏制晋国。而晋国也没有必要主动挑衅齐国，以免被秦、楚等其他崛起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对于齐、晋两国，发动战争所获得的净收益小于争取国际合法性的净收益，故而皆不选择战争。而且此时仍属春秋初期，国际体系比较稳定，周礼依然受到遵从。齐国和晋国都选择争取周天子的认可，因此，周天子也不需要惩罚擅自发动战争的大国。这种情况下，权力转移实现和平让渡。这一案例反驳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①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权力转移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认为，从上一任霸主国实力衰弱到下一任霸主国成功崛起的过程是一次权力转移。^② 例如，在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当时的霸主国英国实力开始衰弱，而崛起国则有德国、苏联和美国。英国与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实力迅速下降，不再具备维持霸主地位的实力。此时的美国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和强大的综合国力，顺利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两国间并没有爆发战争，霸权是和平让渡的。这一情况与齐晋之间霸权的和平转移类似。在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发生内乱，实力衰退，不再是霸主国，当时的国际体系出现了霸主的空窗期，存在晋国和楚国等崛起国。宋襄公所领导的宋国由于综合实力较弱，并被楚国击败，不能被称为崛起国。晋国通过城濮之战击败楚国后才奠定了霸权地位，因此，在从齐国

^①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②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2, 1996, pp. 235-260; David Kinsella, "Nested Rivalries: Superpower Competition, Arms Transfers, and Regional Conflict, 1950-1990",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1, No. 2, 1995, pp. 109-125.

□ 当代亚太

到晋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晋国没有直接挑战齐国的霸主地位，也没有与齐国爆发大规模争霸战。

（三）晋秦权力转移与崤之战

晋秦之间的权力转移以崤之战为转折点。在公子重耳尚在各各国游历之际，秦穆公重视重耳，扶助重耳登上晋国君主的王座。因此，晋文公时期两国关系密切，被称为“秦晋之好”。事实上，秦穆公早在晋惠公时期就已开始扶植晋国国君。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在赴齐桓公所召集的葵丘会盟途中去世，晋国内乱。继任的骊姬之子奚齐为大臣里克所杀。秦穆公扶助夷吾继位，是为晋惠公。但晋惠公上台后并没有采取对秦友好的政策。公元前647年，晋国大旱，向秦国请求援助粮食，秦穆公决定援助。其后不久，秦国荒年，秦穆公向晋国求粮，但晋惠公不仅不援助，反而乘其虚弱攻打秦国。这一战中秦穆公获胜，并俘虏了晋惠公夷吾。由于周天子求情，秦穆公释放了晋惠公。但是当晋惠公于公元前637年去世之后，在秦国为人质的太子圉逃回晋国即位为晋怀公，引发秦国不满。秦穆公设法送重耳回晋国，立为晋文公。^①

在“秦晋之好”时期，秦国支持晋国称霸。例如，在周襄王逃难一事上，秦穆公原本想要勤王，但是最后将功劳留给晋文公。当然，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存在被离间的可能。例如，当时的郑国依附楚国，拒绝参加晋国的会盟，因此晋国联合秦国讨伐。烛之武在游说秦国时提出“邻之厚，君之薄也”，有效说服秦国，使秦国提前撤军。^②果然，在晋文公去世后，两国间爆发崤之战。秦国在此战的失败意味着秦国并没有取代晋国成为新霸主，晋国维持了霸主地位。从战争意图看，秦国此战并非主动挑衅晋国。在晋文公去世后，秦国在郑国的驻兵秘密报告秦国，可以出兵占领郑国国都，因此秦穆公命百里视率军出征。然而，这一军事行动被郑国商人弦高发现，他假传郑穆公之意，犒劳秦军，导致秦军认为郑国已做准备，难以偷袭。因此，秦军改而攻占晋国的边境滑地。当时，晋文公刚死，未办完丧事，晋襄公震怒，在崤大破秦军。^③从结果上看，此战宣告了秦晋密切关系的破裂。

① 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史记·秦本纪》。

② 左丘明：《左传·烛之武退秦师》。

③ 据《史记》记载，“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经，发兵遮秦兵于轅，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参见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崤之战意味着晋国的霸权并没有被秦国取代，尽管晋文公去世，但晋国的军事实力依然强盛。^① 秦穆公也试图建立霸权，在崤之战失败后励精图治，^② 之后将兵伐晋，大败晋人。“秦伯伐晋，济河焚舟……遂霸西戎”。^③ 在秦穆公最终战胜晋国并称霸西戎后，周襄王派使臣送来了铜鼓赏赐秦穆公以示祝贺，这标志着秦穆公成为春秋霸主之一。^④

比较秦穆公与之前各霸主崛起路径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秦穆公没有勤王，也很少会盟，其实现权力转移的主要路径是战争。孔子评价道：“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穀，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⑤ 这一评价虽然认可其霸主地位，但重心在评价内政——“行中正”，能用贤，而没有提及其是否采取尊王的举措。这一方面与晋国仍是霸主国有关，周天子的认可与会盟等众望所归的合法性措施主要聚集于晋国。另一方面，体系演化、规范退化与周天子合法性弱化开始出现。由于齐桓公与晋文公称霸分走了周天子的部分权威，诸侯对周天子的尊重开始减弱。因此，只要新的崛起国击败了前任霸主，就很有可能成为新任霸主，而周天子的认可在此时并非成功称霸的先决条件。这一结果符合前文关于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演化博弈的分析。这个三方博弈模型不稳定，只有一个稳定点。由于周天子难以有效约束霸主国，自身合法性下降，诸侯国在天子和霸主国间会渐渐偏向霸主国，体系逐渐变得不稳定。此时若出现新的崛起国挑战霸主国，周天子在合法性削弱的背景下难以选择“惩罚发动战争的国家”策略，而容易选择“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策略，这与晋秦权力转移过程相符。在晋国实力依然雄厚且尊奉周天子时，秦国不战胜晋国则难以获得周天子的认可。实力原则开始逐步替代礼法秩序，故而伴随着春秋礼崩乐坏的是战争烈度和次数的上升。

（四）晋楚权力转移与百年对抗

与中原各诸侯国不同，楚国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国，这也使得楚国很难从

① 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③ 左丘明：《左传·文公三年》。
④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⑤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 当代亚太

周天子那里获取合法性，故而楚国的崛起过程没有采取其他大国“尊王攘夷”的传统策略，例如，公元前606年的“楚王问鼎”事件表现出了楚国对周王的挑衅。^①

晋楚两国的权力转移持续了多年，从城濮之战到第二次弭兵之会，历经了从晋国独霸到晋楚共治的局面。城濮之战以晋国获胜告终，晋国成为霸主，但是楚国并没有完全臣服，一直伺机报复。楚庄王上台后，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当时的霸主晋景公求援，但晋国从实力对比和作战距离等方面考量，没有援救宋国，可见楚国强大的实力使晋国有所顾忌。^②公元前597年，楚庄王攻打郑国，晋国出兵救郑，两国爆发“邲之战”，楚国获胜，郑国、许国等小国归顺楚国。晋楚为争夺小国而多次爆发战争，由于连年战争，晋楚两国消耗巨大，难以长期承受，最后选择划分势力范围。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晋楚两次召开“弭兵之会”，春秋进入了晋楚两霸共治的阶段。^③

楚国的崛起没有选择尊王攘夷的传统策略，而是通过战争和拉拢处于中间地段的郑国等诸侯国来扩大势力范围。笔者根据《春秋》和《左传》的记载统计，楚庄王在位期间总共发动了25次战争。^④公元前597年，晋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邲之战，楚国终于战胜了晋国成为霸主国。^⑤除了和晋国的正面战争之外，楚国发动的战争大多与郑国有关，因为郑国在地缘上位于晋国和楚国之间，是中原的中心地带。据统计，楚庄王在位期间共举行了4次会盟，^⑥但均不是大规模会盟。楚国长期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而且缺乏周天子的支持，故而楚国的号召力不大。邲之战之后，公元前598年，楚国在辰陵举行了会盟，与会者有郑襄公和陈国太子，此次会盟是楚庄王获得霸权的标志性事件。^⑦

① 左丘明：《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对着来慰问军队的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

② 据《左传》记载：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乃止。参见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五年》。

③ 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1~54页。

④ 参见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

⑤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⑥ 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附录3春秋左传会盟表”，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4~572页。

⑦ 《左传·宣公十一年》。

由于楚国争霸时期，晋国的实力一直较为强大，国际体系可以被视为两极格局。^① 晋国是霸主国，楚国是崛起国，因此楚国的选择符合第一个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周天子—崛起国—霸主国）的结果。演化稳定的结果符合 $E_7(1, 1, 0)$ ，即周天子接受尊奉自己的大国称霸，崛起国主动发动战争，霸主国争取周天子认可。稳定的条件是 $R_2 - C_2 < r_3 - D$ 且 $r_1 + U < bR - tC$ 。此时已经是春秋时期的后半段，周天子的实力与合法性均明显降低，无力与强大的诸侯国抗衡。对于周天子而言，接受称霸的净收益大于惩罚发动战争的净收益。而对于楚国这一中原体系之外的大国而言，由于难以从周天子处获得霸权合法性，楚国倾向于通过战胜现任霸主国实现权力转移。对于晋国这一姬姓国家而言，其霸主地位受周天子的认可，没必要更弦易张，维持周天子的合法性是其最佳选择。因此，楚国的崛起只有战胜晋国才能实现。

六、春秋霸权更迭的思考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春秋时期各国争霸为何不是稳定的结果？国际体系为何会从春秋演变为战国？我们试图从春秋历史中发现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背后的体系原因。基于演化博弈和对春秋各霸主国的历史梳理，本文发现，国际规范的退化亦即礼崩乐坏、周天子合法性的减弱和争霸模式是主要原因。表 7 将春秋时期公认的四位霸主的崛起策略与称霸情况进行了对比，可以发现，随着霸主国的更迭，争霸模式从尊周逐渐向争强转移，战争增加，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表 7 春秋时期霸主的外交事件统计及其特点

	齐桓公	秦穆公	晋文公	楚庄王
在位时间	公元前 685～ 前 643 年	公元前 659～ 前 621 年	公元前 636～ 前 628 年	公元前 613～ 前 591 年
国际格局	单极，齐国独霸	单极，晋国独霸	单极，晋国独霸	两极，晋楚两强
称霸事件	鄆之盟（齐、宋、 陈、卫、郑参会）、 葵丘之盟（周、 鲁、齐、宋、卫、 郑、许、曹参加）	战胜西戎	晋楚城濮之战，这 是春秋时期第一次 大规模的争霸战	晋楚邲之战，楚 国获胜

① 参见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

□ 当代亚太

与周天子关系	周襄王参与“葵丘会盟”，并在会盟上认可齐桓公为霸主	在秦穆公战胜晋国并称霸西戎后，周襄王派使臣送了铜鼓赏赐秦穆公以示祝贺	晋文公出兵帮助周襄王平定王子带之乱，城濮之战后，周襄王表示祝贺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问周鼎之轻重
总战争数	30	15	9	25
平均每年战争数	0.72	0.39	1.1	1.14
总会盟数	16	2	3	4
平均每年会盟数	0.38	0.05	0.38	0.1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王日华：《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

（一）霸主出现与周天子合法性下降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礼制体系是建立在等级制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安排。周天子对诸侯国拥有权威与合法性，诸侯在对周天子臣服和认可的情况下获得国内治理的合法性。因此，周天子的合法性与诸侯国国内的稳定统治是密切相关的，各层利益与血缘相连，构成稳定的系统。然而，社会在不断演变，在长期安定之后，周朝各诸侯国面临周边戎狄的入侵风险，而周天子并没有集中兵权，在征伐中需要强大的诸侯国出力，这些大诸侯国在提供稳定秩序这一公共产品后，也相应提升了自身的威望，进而导致周天子合法性的相对削弱。

周天子的合法性在春秋时期经历了衰减。一方面，春秋时期，周朝经历了多次内乱，先后经历王子克、王子颓、王子带和王子朝之乱。^① 这些内乱引发了诸侯国的干预。在齐桓公时期，周惠王晚年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但遭到诸侯的阻止。公元前 655 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与周太子在首止会盟，以支持周太子姬郑顺利继承王位。公元前 653 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再次召集诸侯进行洮地会盟，确保周太子姬郑继位为周襄王。周襄王时期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公元前 649 年，王子带联合一些小诸侯国攻入周朝都城，被周襄王击败。公元前 636 年，王子带再次发动叛乱，周襄王出逃到郑国。当时齐桓公已去世，齐国陷入内乱，无力援助。晋国出兵杀死王子带，扶助周襄王复位。^②

^① 公元前 693 年，周王室发生“王子克之乱”。公元前 675～前 673 年，发生“王子颓之乱”。公元前 649 年～前 638 年，发生“王子带之乱”。公元前 520～前 503 年，发生“王子朝之乱”。参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②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频繁的内乱削弱了周王室的实力和权威。

另一方面，尽管周天子通过授权霸主国征伐实现双赢，但是在与霸主国互动过程中的某些举措有损周室的合法性。首先体现为让渡征伐权力。在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举办的葵丘会盟中，周襄王派遣宰孔为特使，赐予齐桓公象征王权的“文武胙、彤弓矢、大路”。^① 这表明周天子授予齐桓公代表天子进行征伐的权力。尽管齐桓公无意挑衅周王室权威，但天子的权威和合法性显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此后，鉴于楚国长期游离于中原体系之外，为安抚楚国，公元前 671 年，周天子授权楚国可以在南方征伐，“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② 对此，司马光评价春秋时期周朝的衰弱，认为关键在礼的丧失。“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③ 其次体现为周天子没有制止霸主国的一些僭越行为。晋文公成为霸主后，“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④ 使各诸侯国不仅对周天子朝贡，也朝贡晋国。这在事实上削弱了周王室的权威，导致其他诸侯对周王室的支持度相对削弱。

当然，周王的合法性在春秋时期虽然受到削弱，但仍远远高于战国时期。尽管周天子赐予霸主国征伐的权力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但是也对于霸主国的过分要求加以遏止。例如，晋文公想用王礼安葬的愿望被周天子拒绝。^⑤ 楚国问九鼎，周室回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⑥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名”“分”加以解读。“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而在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后成为新诸侯，导致“名”“分”也遭到彻底破坏，先秦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⑦

霸主与周天子合法性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一方面，两者相互促进，霸主需要得到周天子的合法性授权，而霸主国尊王攘夷的行为又有助于维持周天子的地位。另一方面，两者相互侵害。周天子只是靠血缘和合法性等软性手段维系与诸侯国的关系，当诸侯国不服从周天子或者转而支持霸主国时，周天子

①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

②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④ 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年》。

⑤ 左丘明：《国语·周语中》“襄王不许请隧”。

⑥ 左丘明：《左传·宣公三年》。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 当代亚太

很难通过惩罚措施纠偏，从而导致规范退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一旦霸主国声势已成，则纠偏代价愈重，周天子合法性愈加容易遭到削弱。同时，周天子合法性降低又从根本上导致尊王攘夷的大国称霸模式难以长久，致使春秋后期的大国崛起更偏向与现任霸主国大战的方式，而这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国际秩序，致使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数量越来越多，最终使东周从春秋走向了战国。

(二) 规范退化与权力转移

由于周天子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下降，进而导致支持周天子的诸侯越来越少，支持霸主国的诸侯越来越多。随着强大的霸主国利用军事力量维持体系稳定的行为愈益频繁，原本应该由天子行使的职责“礼乐征伐”被部分转移到了霸主国手中，而霸主国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日益增强。此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① 因此，东周体系持续退化，进入了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图 1 总结了本文案例研究的四个霸主国齐国、晋国、楚国和秦国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战争数量，可以发现，齐桓公称霸时期，这四个大国参战数量不算多，而在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时期，这四个大国的战争数量显著增加。到战国时期，秦国在变法后参战数量激增。可见，权力转移导致的战争数量和规模受到当时体系层面的国际规范的约束。在春秋早期周天子合法性较高时，大国间的争霸战较少，而到春秋中后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由于规范退化，战争愈发惨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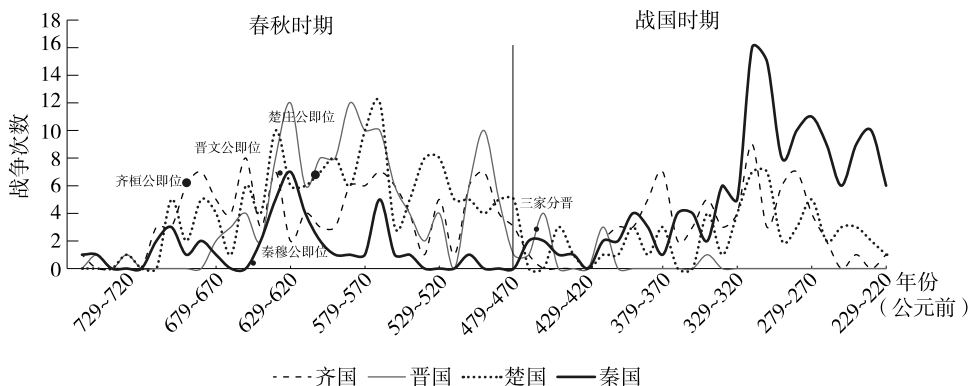


图 1 春秋、战国时期四大国战争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制作

^① 《论语·季氏篇》。

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权力转移并不一定导致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遏制战争。根据对春秋霸主国崛起模式的分析，齐国与晋国的权力转移是和平过渡，这既与双方崛起模式均为“尊王攘夷”有关，又与当时尚为春秋早期、周天子合法性较高有关。因此，体系规范与合法性等虽然只是大国崛起的背景性因素，却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崛起战争的频率和规模。

七、结 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① 本文希望通过借鉴中国古代历史，帮助我们权力转移理论加以创新。首先，规范退化对权力转移过程中争霸战的爆发具有重要影响。春秋体系的演变显著影响了各诸侯国争霸时的战争选择。周朝王道“纯任德教”，^② 其秩序维持的前提是周天子的合法性权威以及诸侯的支持。然而，周朝缺乏惩罚力量将加速国际规范的退化，当周天子无力约束时，强大的诸侯国会代之执行惩罚，成为霸主。“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③ 但是霸主国的这一举动虽然维持了国际秩序，却同时破坏了周天子的合法性。因此，春秋早期，权力转移能和平过渡。然而，到了春秋中期，由于周天子合法性下降，崛起国难以仅仅依靠周室的承认就成为新的霸主，而需要在与前任霸主国的决定性战争中获胜。

其次，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大国崛起需要注重国际体系的规范与合法性。如果崛起国不重视国际规范，纯任征伐，则将重蹈秦统一六国后迅速灭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覆辙。在体系变迁和规范退化的背景下，权力转移导致的争霸战可能演变成惨烈的大规模战争。事实上，除了从周天子获得合法性这一渠道外，还有其他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如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等。一国崛起若不考虑自身合法性，而只考虑军事实力，则将如一战战败后再次发起二战的德国那般，“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④ 如何兼顾实力与道德？如何为当今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如何获得各国支持与合法性？这也是中国未来在崛起道路上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① 刘昫等：《旧唐书·魏徵传》。

② 汉宣帝批评王道时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

④ 杜牧：《阿房宫赋》。

security only along a single dimension. This is to say that these frames have clear impact only with respect to either attitudes or cognitions. Only pro-American frame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ort on either the cognitive or attitudinal dimension. This illustrates that public cognitions and attitudes with respect to security are relatively stable over long-term processes of political-socialization, and that they further adapt to homogenous publ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differences across the various frames by considering media oversight and micro-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Finally, it considers a modality for understanding a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vis-à-vis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on, while also discussing how to carry out public education on state security.

Key Words: Media Frames; Views on Economic Security; Cognitive Dimensions; Attitudinal Dimensions; Experiment

About the Author: Hou Weigang is a 2020 Ph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ower Transition, System Evolution and Hegemonic Chang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 Haixia and Sun Zhaorui

Abstract: Does power transition come with large-scale war? Reviewing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hegemonic transi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ffers a number of new ideas. Drawing on explanations from theories of system evolution and normative change, this article makes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whether or not power transition is accompanied by large-scale war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dynamics caused by the power gap between the rising state and the hegemon, but also on whether the rising state adopts a deferential or aggressive approach to power. In the case of the rise of the Kingdom of Qi, the initial hegemon may opt to pay respect to Zhou, however in accepting the hegemon's status, the Emperor of Zhou may also weaken his legitimacy, which in turn result in a deterioration of norms, and in turn result in major state's adopting a more aggressive path to its rise. This will result in a greater risk of war.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wo models of three-player evolutionary games: one involving the Emperor of Zhou, the rising state and the hegemon; and a second evolutionary game involving the Emperor of Zhou, the hegemon, and the other states with allegiance to the hegemon. The equilibrium solution of the games confirms the above hypothesi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compares the paths to hegemony taken by the Duke Huan of Qi, Duke Wen of Jin, Duke Mu of Qin, and King Zhuang of Chu. This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argument

supporting why there were fewer hegemonic war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more during the later years.

Key Words: Power Transition; Hegemonic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volution; “Respect the Emperor and Defend against the Barbarians”

About the Authors: Qi Haixi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Zhaorui is a 2021 Master’s Student at the 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Role of Vietna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U. S. Trade Friction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China’s Exports to Vietnam

Yang Panpan, Xu Qiyuan and Zhang Zix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role of Vietna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U. S. trade and commercial friction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search is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nd structura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hina’s exports to Vietnam, which have taken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U. S. trade frictions. This paper builds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systematically decomposing China’s exports to Vietnam. It combines and incorporates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list of tariff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the details of U. S. -Vietnam trade, the types of Chinese products exported to Vietnam,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technology. Three types of effects are distinguished: shocks from trade frictions;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We fully consider the direct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impact of production transfers on exports. The paper goes on to apply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 methodology to measure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of China-U. S. trade frictions on China’s exports to Vietnam,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impacts across various categories of products. The analysis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pact of China-U. S. trade frictions, which has greatly bolstered China’s exports to Vietnam.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 production transfer from China to Vietnam cannot be ignored. While so,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still based on complementarities.

Key Words: China-U. S. Trade Frictions; China-Vietnam Trade Relations; Export Decompositio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 Division of Labor

About the Authors: Yang Panpan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u Qiyuan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ang Zixu is a 2019 M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